

## 關於和刻本十三經注疏

長澤規矩也著 蕭志強譯\*

江戶時代隨著經學普及，開始有人進行注疏翻刻工作，依我所見，最早的是以下三種：

- (一) 《春秋左傳注疏》題簽左傳注疏正義 大六十冊
- (二) 《孝經注疏》題簽孝經注疏正義 大三冊
- (三) 《爾雅注疏》題簽十三經注疏爾雅 大十一冊

這三者全都是北監本的覆刻，再加上「返點」與「送假名」。至於後來的印本，《左傳》方面有「京都出雲寺和泉掾」等，《爾雅》有大坂葛城長兵衛等，以及名古屋的菱屋久兵衛等附有封底頁的版本。特別是《爾雅》的覆刻本寫道：「文久二年補刻，浪速書肆積玉圃梓」。然而，在比較接近初印的版本，則三種都沒有附封底頁，刊年因此未詳。松澤老泉在《經籍答問》（國書刊行會本解題叢書，頁五四七）中提到，他不曾在書肆中看到過有刊年校者的版本，因此，他將這些版本推定為寬永到元祿之間所印刻，並接受前輩的說法，也就是這些版本乃是江戶之松會三四郎捐錢給諸侯，全部刻印十三經的成果。然而事實似乎並非如此，因為三種版本之中，只有《爾雅》的封面比較早，但年代上應該還不到寬永。至於《左傳》與《孝經》由封面看，應該是寬永以下的作品。在冊數方面，《左傳》六十冊分裝本流傳下來的很少，大多是裝訂成二十冊。《爾雅》後來的印本也裝訂成五冊，至於裝訂成十一冊的傳本則不多。

- (四) 《孝經注疏》題簽亦同 大三冊寬政二年六月，京都，唐本屋吉左衛門刊

在封面裏頁的地方，書名左右寫著「寬政再刻」及「皇都書肆 玉樹堂」。玉樹堂乃是唐本書店。首先，寬政二年六月，伊藤善韶寫了一篇〈再刻孝經注疏序〉，

\* 蕭志強，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。

裏面提道：「平安書肆玉樹堂。抽刻萬曆板十三經中《孝經》。行于世也久矣。戊申之歲。書肆罹災。藏板亦燬矣。主人爾來東奔西走。勞心忉忉。頃者開舖復業。首再翻刻舊所藏《孝經注疏》。刻成。持來託序于予」。其中，戊申就是天明八年。若然，《孝經》以及上記三經到底是玉樹堂所刊刻，還是玉樹堂與松會共同出版，抑或是玉樹堂遭遇火災之前就已經拿到刻板了？或者是上記三經之外，玉樹堂另行刊行了孝經？答案或許就是四者之一，但照我的看法，大本《孝經》應該不出（二）與（四）。正因為板子燒毀，所以沒有傳本，這樣的說法似乎理所當然。然而，其他二經已經有他梓印行的後印本，《孝經》也有缺封底頁的稍後印本。而且與（二）之間，幾乎在訓點上沒有差別。所以，或許是被火災燒毀之前，玉樹堂就已經把松會所開板的《孝經注疏》拿來印行了。至於（四）的後印本之中，還有一種版本是同一題簽，而且除了伊藤之序，底頁還有江戶須原屋茂兵衛等江戶大阪各三肆之記載。

（五）《尚書注疏》題簽亦同 大十册安永六年七月，京都，田中市兵衛等刊

這是今村八兵衛、吉田四郎右衛門、風月莊左衛門與四肆之合刻。乃是監本所覆刻，雖有「返點」，但無「送假名」。有時會在開頭的地方注解與一本之異同。有安永六年六月芥川元澄（丹丘之子）之跋。十三經注疏的中和刻之中，舉了上記三種，並且說明是爲了窮鄉之寒士及書肆之求，才以萬曆本爲根據，參考嘉靖本汲古閣本進行校對，費了十年之久才上梓完成。頭注乃是元澄所加。封底頁雖然記載「毛詩注疏、嗣出」，但這部分應該沒有刊行出來。

（六）《大學注疏》題簽亦同 大一册天明七年正月，江戶，須原屋平助，京都，須原屋平左衛門刊

這是燒板目錄著錄。刊行的隔年因爲京都發生大火使板木燒失，所以傳本很少。此版無校者之序跋，而且是從沐日堂刊本《四書注疏大全》之中抽取《大學》加以覆刻，並且附上「返點」。而最初的四頁除了經注之外，還略加了「送假名」。此版與沐日堂刊本相比，可以發現首行將「《禮記注疏》卷第六十」改爲「《大學注疏》」，第二、三行的校對者姓名加以省略，第四行的「《大學》第四十二」以及其下的「○陸曰」之「○」也省略，以下的內容則填上去，第七行以下相同。卷末的「注疏卷第六十」六個字也削除。版心中間部分則把「記疏六十」改爲「注疏」。

（七）《論語注疏解經》題簽論語古注疏 半六册寬政十二年，總州，六經舍關氏刊

## (八) 《毛詩註疏》題簽毛詩古註疏 半？册文化元年，同上刊

這是汲古閣本所覆刻，加上返點而成。在（七）卷末有一行刊記「寬政十二年歲在上章涪灘六爻舍關氏雋」。這是關盈文校點家刻本。關氏傳未考，但在東條琴臺之《諸藩藏版書目筆記》卷二「福井藩」項下記載，關氏乃下總國的土豪。兩書卷首上有寬政七年關氏之〈刻十三經古註疏序〉，並且兩書同版。此版比和刻本之唐本便利且價格便宜，紙質也較好，版本至今沒有磨滅，而且有返點，適合作為童蒙之讀物。這第四項與序提到，「吾家別有世業。不能專力於斯。乃不復遑就有道而下焉」，似乎證實了關氏為土豪的說法。而序文有所謂「但註之與疏。一二照諸家藏之書。以標註其同異。無音註者亦補入之」，本文往往加上頭注，並且將皇疏本、集注本、石經以及其他經史之間文字異同與原本之誤刻都加以注記，並且增補其音，可說在校對與刊刻的過程中頗費苦心。雖然關氏自己說傾家資從事此工作，目的無非是報國恩於萬一，但壯志終究沒有完成。琴臺記載說，最後只有《孝經》與《論語》完成，《詩經》則只出版到一半，關氏已經過世。然而，我卻不曾見過《孝經》，《毛詩》也只有加長本的五册，卷三之一止於「定之方中」。或許有可能是已經刻成，但還沒有摺頁。《毛詩》傳本相當少，家藏之外只有往年以汲古閣本為根據加上一些補充，而這部分也比家藏本少。在詩之中很少有頭注，並且沒有〈詩譜序〉。根據《論語》的頭注，則顯然所根據的原本文字也不鮮明。因此，關氏很可能是根據汲古閣後印本，而沒有使用阮氏之《校勘記》。至於《論語》後印本，則去除了關氏之序，刪掉每本首尾及卷末版心中「六爻舍藏」的文字，並將卷末刊記的一葉加以改刻，加上「強化二年十月、京都出雲寺文次郎、大阪河內屋茂兵衛、同秋田屋太石衛門、江戶和泉屋善兵衛」等四肆之底頁說明。至於藍色封面上則貼附有「論語古注疏卷幾」之題簽，以此印行完成。此版本便是明治二年印本之前身。

## (九) 《論語註疏解經》題簽論語註疏 半五册

## (十) 《孝經註疏》題簽亦同 半一册

這是汲古閣本覆刻。只有句讀，沒有頭注，與（七）文字多少有異同，有些頁數文字較圓，墨丁部分（卷十四第十八葉）則相同。大概是因為校對產生的差異吧，原本應該是汲古閣本的後印本或者家刻本，但未記載刊者姓名，難以詳知。初印本上沒有版權頁。（九）開頭部分有「翻刻十三經目錄」，上面寫道：

「一《論語註疏》 出來 一《孟子註疏》 追刻 一《孝經註疏》 同上……」

，每行一書，依次進行，以下則分別是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易經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。此頁版心下部有「汲古閣」三字，但刊行之順序完全與毛氏刊刻之順序不合。因此，此版本應該是和刻本之刊刻。然而，其中沒有《孟子》，《詩經》等各經也都未刊。（九）之中同樣題簽的有八冊，並沒有附上「翻刻十三經目錄」之一葉。（九）與（十）都是在稍後印本上改刻題簽，捺上「中山侯藏」之朱印，然後寫上刊記「享和元年辛酉春二月」以及書肆之名。《論語》裝成六冊，有京都植村藤右衛門與東都北圃茂兵衛之名，《孝經》則裝訂成三冊，列了京都吉村吉左衛門以及京都風月莊左衛門（包含植村）等十人，以及江戶北圃茂兵衛等四人、大阪柳原喜兵衛等三人之名。其中所謂中山侯，或許就是中山大納言，或者水戶之附家老，但詳細仍未可知。附有版權頁的版本可能是借來版本印成的。至於林博士的《論語年譜》中則沒有收錄（九）。

（十一）《周易兼義》題簽周易注疏 大九冊

（十二）《周易注疏校勘記》題簽亦同 大三冊

（十三）《論語注疏校勘記》題簽亦同 大四冊

這三種版本都採取稍縱長的唐本裝訂，並以黃色紙為封面。在（十一）之中，眉上部分有「嘉慶三年仲冬」字樣，封面則使用汲古閣原本十三經注疏「金閩書頁堂重雕」及「周易注疏」略例附之封面，並將張氏的〈十三經注疏序〉原序也翻刻，序文並沒有加上句讀。或者這是將嘉慶覆毛本覆刻而成的，本文則只有句讀而沒有返點。至於（十二）、（十三）則是阮氏原刻本之覆刻，本文有句讀。在（十二）之中，封面將「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」、「揚州阮氏文選樓藏版」的原封面改成朱色，阮氏上表、段氏原序、原凡例與原目等，則如原本地覆刻。至於《論語》，則無封面裏頁。

第十二沒有載明刊者姓名，但應當是福井藩出版的。書肆琳琅閣主人的傳也同意這種看法。所謂福井藩版，諸藩藏版書目筆記卷二中有詳細記錄。以上記載其中重點，主要提到儒官高野物左（一本作右）衛門（天保十年歿，年七十九）曾詢問琴臺，說曾因為工作繁忙中斷了印版工作，但在高野過世後又想到做這件事，於是購買關某的板木，將還沒刻版完成的《詩經》繼續刻下去。當時琴臺乃是高野門人，透過藩之記室岡本慎助，建議藩主為了藩的面子，應該從事校勘記附之新刻工作，藩主也同意了這項建議。然而，不久慎助過世，加上該藩發生許多事情，重新刻版的工作再度終止，而已經刊行的種類也不清楚。筆記中有「汲古閣本《孝經正

義》九卷三本、汲古閣本《論語正義》廿卷十本、《周易正義校勘記》附十一卷九本」等記錄。而諸家藏板目錄私記（宮內省圖書寮尊藏、撰者缺）之福井藩松平越前守的條項之中，有「汲古閣《論語正義》廿冊、《校勘記》付《周易正義》、同《毛詩正義》」（譯者按：所謂「出來」是「有」的意思）的記載。又，在《書僧贅筆》（收錄於《日本隨筆大成》）中有「越州家御藏板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《易》、《論》、《詩》出來，同《校勘記》，《易》、《論》出來」的記載。三者並不相同。現在的松平家並沒有完全收藏這些諸本，而蘆田伊人氏曾透過關係想見松平家的目錄，同樣發現相關的記載並不完整。因此，詳細的狀況已經無法完全考證。然而，易之中有一種用藍色封面、裝訂成十二冊的半紙本後印本。本文以及《校勘記》後面，雖然附有弘化二年的版權頁，但如果我們參考上記六經舍刊本《論語》之弘化二年印本與版權頁同版，便可了解福井藩從事注疏校勘的工作不過數年就已中止，而由前記四肆接收藩之新刻，並將關氏舊版全買下來，再進行印版的工作。從其中《論語》題簽體裁完全和《周易》一樣看來，藩之中並沒有《論語》本文之新刻，只不過體裁方面爲了統一，只有將題簽卷末的一葉加以新刻，再配上新刻之《校勘記》而已。冊數方面，則合併弘化二年印本之本文，總計十本。可說是將六經舍之名加以削除產生的版本。其中《詩》的部分沒有雕刻完成，《孝經》則不明。根據我的臆測，《孝經》可能只有在六經舍版或者越前藩版出過一版，而這裏所謂的《孝經》，或許只是（十）之沒有版權頁的誤認。總之，要了解確實狀況，除非發現《孝經》新版本否則無法下結論。

弘化二年印本之後，明治二年曾出版《校勘記》附《論語注疏》大本十五冊。題簽則「論語注疏」與「論語注疏校勘記」的部分爲新刻，並且本文與《校勘記》的開頭部分有封面裏，未了並有版權頁。封面裏文字有三行，右邊爲雙行之「魏何晏集解、宋邢昺疏」，其下則有「校勘記附」（《校勘記》並沒有這四個字），中央大字則標示「論語注疏全」或者「論語注疏校勘記全」，左邊則兩者同樣標記爲「東京書肆文江堂藏」。其中，版權頁列了東京須原屋茂兵衛等十二人的姓名。此版本一見爲別版，但事實上不過是（七）之後印本，也就是弘化二年印本以及（一三）之合印本。

明清版的注疏翻刻本如上所示，大多是唐本添加而成。此外，諸書卷末廣告之中，有時會出現注疏。比如，在附有版權頁的元文元年京都植村藤古衛門等人所做的《晏子春秋》附載之〈平安書肆植村玉枝軒儒書藏板目錄〉，記載有《論語注

疏》十册、《孟子注疏》十册、《尚書注疏》十册。然而這部分可能沒有刊行出來。至於寬延二年作跋的古今注京都山田三良兵衛藏板之中，則說有《爾雅注疏》全十册。這可能是（三）之後印本，或者是另外版本的未刊本，狀況不明。類似這樣的狀況，其他應該還有許多。

如果我們把以上記錄的地方從各經別的角度加以考察，就會發現《易校勘記》附一版二式，《書》一版，《詩》一版未完，《大學》一版，《左傳》一版二式，《論語》二版五式，同《校勘記》一版二式，《孝經》三版五式（其他有的是一版，也就是六經舍刊）、《爾雅》一版三式（把補刻本視為相同）。至於如果尋找各版之原本，則萬曆版也就是監本為四經五版，崇禎版也就是汲古閣本（毛本）為三經四版，嘉慶覆毛本為一經一版，沐日堂本一種，《校勘記》原刻則為二經二版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另外其他系統，就是松崎謙堂之影寫本及細川家刊行的足利學校所藏越刊八行本《尚書注疏》。弘化年間的刊本有大二十册之多。這些作品採取藍色封面，有明治之後印本。附帶一提，細川家原本也打算覆刻《周易》之越刊八行本，其影寫本目前收藏在細川侯爵家，至今尚未刊行。這部分的覆刻果然因為有大儒參與，並由大藩加以出版，品質精美遠非上列各書可比。最重要的是，這些刻版，有許多是當時清國已經完全消失的古版本覆刻，刻工精細，完全按照原樣，即使是原本補刻的部分，也比覆刻本明瞭，品質非常之高。而且，細川侯爵家注疏覆刻的目標不止易與書，從他們建議幕府命令十萬石以上大藩合力出版大部頭書籍的奏章「關於官版開彫之意見」<sup>①</sup>，可以發現當時曾有五經上梓的計畫，並且《易》、《書》與《左氏》有單疏本傳存，打算加以出版，欠缺的《禮》則根據紹熙刊本，《詩》則根據附釋音建本，抄出其中的疏而加以補充。所謂單疏本之傳存，乃是將足利時代刊本加上古活字印本之古注，校訂其中《禮》與《詩》注疏本的錯誤，從而出版了我國新編的注疏合刻本。同樣的，《易》、《書》與《禮》之紹熙刊本（也就是我所謂的越刊八行本），將附釋音建本之《毛詩》與《左傳》的形式加以改變，成為前三經之體裁而出版。由此可見，細川侯爵家當初進行這個注疏與翻刻計畫，工程非常龐大，甚至為中國所不及，只可惜出版計畫中途停止，沒有持續完成。

<sup>①</sup> 根據明治二十五年刊《支那文學》雜誌指出，有山下重房石印單行本。

附 記

這部分乃是將登載在《支那學》的舊稿，根據新出現的沐日堂刊本《四書註疏》加以修改，加上其他多少推定的部分，補充最後一段。明治七年，大阪龜屋安兵衛曾刊印所謂的《十三經註疏篇目》（三谷景從編）。其中只有錢序的《毛本注疏》之各經目錄中，記載了毛本之頁數。

——譯自《長澤規矩也著作集》第1卷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2年8月），頁46-52。